

改革开放

20年

李振亚 主编  
张静 副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 改革开放二十年

主 编 李振亚

副主编 张 静

编写者 (以写作内容为序)

李国忠 赵铁锁

佟桂芳 纪亚光

窦爱芝 崔荣俊

张 静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开放二十年/李振亚主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9. 8

ISBN 7-310-01245-3

I. 改… II. 李… III. 政治-大事记-中国-1979~1999  
IV.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13956号

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邮编:300071 电话:(022)23508542

出版人 张世甲

承印 天津宝坻第四印刷厂印刷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1999年8月第1版

印次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89千字

印数 1—1000

定价 10.00元

# 目 录

|                            |         |
|----------------------------|---------|
| 一、走出危机和徘徊 .....            | ( 1 )   |
| 1. 噩梦初醒 .....              | ( 1 )   |
| 2. 徘徊前进 .....              | ( 7 )   |
| 3. 呼唤伟人 .....              | ( 17 )  |
| 二、伟大的历史转折 .....            | ( 26 )  |
| 1. 一场具有深刻政治含义的论争 .....     | ( 26 )  |
| 2. 开创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的里程碑 .....   | ( 41 )  |
| 3.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 .....     | ( 58 )  |
| 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       | ( 68 )  |
| 1. 拨乱反正,历史性课题的解决 .....     | ( 68 )  |
| 2. 农村改革的起步 .....           | ( 83 )  |
| 3. 经济特区的崛起 .....           | ( 95 )  |
| 四、改革的深入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 .....   | ( 103 ) |
|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纲领 .....     | ( 103 ) |
| 2. 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一大突破 .....    | ( 110 ) |
| 3. 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 .....  | ( 114 ) |
| 4. 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 123 ) |

|                                    |         |
|------------------------------------|---------|
| 五、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 .....                | ( 133 ) |
| 1. 重新认识国情 .....                    | ( 133 ) |
| 2. 初级阶段理论 .....                    | ( 136 ) |
| 3. 百年不动摇的基本路线 .....                | ( 149 ) |
| 4. 跨世纪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               | ( 161 ) |
| 5. 治理经济环境,全面深化改革 .....             | ( 169 ) |
| 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和新发展 .....            | ( 175 ) |
| 1. 面临新的挑战 .....                    | ( 175 ) |
| 2. 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               | ( 181 ) |
| 3. 邓小平理论的新概括 .....                 | ( 203 ) |
| 七、高举旗帜,开创未来 .....                  | ( 207 ) |
| 1. 在党的旗帜上书写新的内容 .....              | ( 207 ) |
| 2. 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br>基本纲领而奋斗 ..... | ( 219 ) |
| 3. 二十年的辉煌成就 .....                  | ( 227 ) |
| 4. 新世纪的召唤 .....                    | ( 232 ) |
| 后记 .....                           | ( 237 ) |

# 一、走出危机和徘徊

## 1. 噩梦初醒

1976年是中国的龙年,中国人的本命年,这一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第十个年头。它将带给龙的传人什么呢?是凶,是吉。是悲,还是喜。

元旦,新年第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写于1965年的两首词:

###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 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毛泽东在此时同意发表这两首词的本意已无从察考。但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的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作了如下的解释：

“这两篇光辉的作品，以高度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形象，描绘了国内外‘天地翻覆’，‘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歌颂了革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勇气概，揭示了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的历史规律。”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主席最近又教导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否定或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必然会犯错误……最近教育战线上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

显然，社论的解释和引申告诉人们，这两首词是针对邓小平的所谓“右倾翻案风”的。于是，人们依然在阶级斗争的声浪中翻开了新年的第一页。

1月8日，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真是“天惊一声雷，地倾绝其维。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1月11日，首都百万群众，冒着凛冽的寒风，自发伫立在十里长安街旁，为周总理送行。这种亘古未有的悲壮场面，寄托着人们的无限哀思，反映出人们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人们在悲伤，人们在思考。

但是，与人民的哀思相反，“四人帮”却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从1月9日到15日追悼大会召开期间，新华社总共只发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同周恩来遗体告别和举行吊唁的两条消息。姚文元又把首都百万人民泪洒长

安街为周总理送行的情景描写砍得干干净净。1月28日,江青一伙扣压纪录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不准在全国放映。

“四人帮”还肆意蹂躏人民的情感。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孔丘三忧》一文,用恶毒的语言诬蔑攻击悼念周总理的人们是“哭丧妇”,说什么“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是可忍,孰不可忍!人民对总理的深情岂容亵渎!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愤怒。从2月份开始,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开始出现抨击、声讨“四人帮”的传单和大小字报。3月5日,《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播发的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时,竟把总理为学习雷锋的四句题词全部删掉。3月25日,《文汇报》头版刊登的文章里写道,“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含沙射影攻击周总理。“四人帮”的恶行激起了群众的更大反抗。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

在北京,悼念活动集中在天安门广场。3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红小兵前往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了第一个悼念总理的花圈。此后,北京市各界群众,冲破“四人帮”的层层禁令,纷纷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其中一首诗写道: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这首诗集中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深切怀念和对“四人帮”的痛恨,后来被列为“〇〇一号反革命案件”。

4月4日,连续十几天来的悼念和抗争活动达到了高潮。首都和外地来的群众,不顾当时一再重申的禁令,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数达到了200万人次。天安门前,纪念碑下,成了人的海洋,诗词的海洋,花圈的海洋。人们读着悼念总理的词泣不成声,看着声讨“四人帮”的战斗檄文义愤填膺。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连日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会议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决定当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等措施。会议的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4月5日凌晨清理了天安门广场。

清晨,群众陆续涌到天安门广场。当他们发现花圈被收走,诗词被撕毁,战友被抓走时,异常气愤。数万群众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接着,愤怒的群众烧了“联合指挥部”的几辆汽车,指挥部所在的小楼也被群众点燃起火。下午6时半,广场所有的喇叭反复播放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的讲话,诬蔑群众的行动是“极少数别有用心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并要求人们立即离开广场。9时30分,隐蔽待命的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一齐出动,迅速封锁天安门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留在广场的群众。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天安门广场事件。

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两个决议。一,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两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其后,全国开始追查“政治谣言”,搜捕天安门事件和类似

事件的参加者及幕后策划者。

天安门事件绝不是反革命事件，它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持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人们把恢复社会秩序和党的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却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这使人民群众更加痛恨“四人帮”，而天安门事件正是人民群众这种怒火的总爆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天安门事件又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集中体现，它鲜明地表现了人心向背，以震撼天地的气势，以花山诗海展示了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和高度的政治觉悟，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广场事件后，批邓之风刮得更猛烈了，龙年的人们仍在阶级斗争的漩涡中沉浮。

7月6日，当人们仍然沉浸在失去周总理的巨大悲痛之中时，中国人民无比敬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去世了。全国人民又听到了哀乐声。

9月9日，一个更大的噩耗传来：一代伟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相继去世，这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一霎时，千山肃穆，万水呜咽，神州大地一片悲凉。人们不能不为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

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悲痛欲绝，都为民族命运和前途忧心如焚。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9月11日，王洪文撤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此举的目的在于企图切断党中央同各地的联系，孤立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由他们指挥全国。

9月19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求清理毛泽东的文件、书籍和手稿，企图乘机篡改不利于自己的有关记述，美化自己，寻找整人的证据。

9月29日，江青等人又大闹政治局，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毛远新留在北京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发表煽动性讲话，说什么：“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sup>①</sup>

“四人帮”还伪造了一个所谓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上反复宣传，以党内正统自居。为了上台，“四人帮”还指使其亲信写“劝进信”，制造舆论。他们还在上海加紧武装民兵，阴谋以上海的民兵武装作为他们夺权的后盾。

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就要发难。局势的发展使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他们虽然处境困难，但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消息，并酝酿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的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下定了解决“四人帮”的决心。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华国锋，在考虑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时，彼此想到了对方。经过商议，他们一致认为，“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集团，同他们的斗争不宜采用党内斗争的一般方法来解决，决定以召开会议的方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并制定了行动方案和周密部署。

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一举粉碎。之后，党中央又采取果断措施，挫败了“四人帮”上海余党叛乱的阴谋，控制了事态的发展。

---

<sup>①</sup> 李济琛：《千秋功过》，第30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10月6日晚到7日晨，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并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会议一致通过叶剑英的提议，推选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10月24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10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指出：“粉碎这个反党集团，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

“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四人帮”的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已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这就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1976年，龙年，正是凶中有吉，悲中有喜，真可谓悲喜龙年。但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的命题不可避免地摆到了中国人民的面前。

## 2. 徘徊前进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和灾难，是一场内乱。它乱了党，乱了军队，乱了国家。它乱了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真是天下大乱。长期的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十年间，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的破坏，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与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

毁灭，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流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十年间，直接经济损失 5000 亿元，间接损失更是无法估计。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标志着十年“文革”的结束，中国又一次处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要前进就必须坚决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思想和实践，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前进就必须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清中国国情和特点的基础上，寻找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使我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然而，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不但没能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反而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所谓“抓纲治国”的错误决策，推行“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延缓了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中走出来的步伐，造成了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工作步履艰难和徘徊不前的局面。

1976 年 10 月 25 日，两报一刊发表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社论中，仍然要求人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实质上就包含了“抓纲治国”的意思。1977 年 2 月 7 日，两报一刊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其中明确提出：“当前，就是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指挥下，在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上，把我们的步调统一起来。”1977 年 7 月 21 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又两次提到“抓纲治国”。1977 年 8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本应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但是这次大会没有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华国锋在他的政治报告中，仍然坚持肯定“文化大革命”，继续沿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理论和口号，强调所谓“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并以此为中心，提出各项任务。由此可见，抓纲就是坚持已被“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完全错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思想路线上,华国锋积极推行“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这一思想的提出,与广大群众要求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出来工作有密切的联系。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宣传部门的汇报后指示,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所谓极右路线;强调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华国锋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草稿中又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持制止,不能容忍”的话,随后在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中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3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上的长篇讲话,贯穿了“两个凡是”的思想。针对当时党内外关于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问题的议论,华国锋说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鉴于此,他虽然说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对“四人帮”不满的,但是他仍然肯定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谈到邓小平问题时,华国锋仍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为由,坚持认为批邓是必要的,他再次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华国锋继续推行“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政策,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不是偶然的,这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的政治背景,也和华国锋个人素质相关。

第一,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坚持“左”的政策,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可以说由来已久,并形成成为一种习惯势力。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就犯过三次“左”的错误。解放战争时期在土地问题上也有过“左”的政策。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左”的错误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文化大革命”把“左”的错误推到了极致,其偏颇和狂热,举世罕见。在我国,“左”的错误长期得不到克服,固然有其社会原因,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党内形成了一种“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错误倾向,而且在党内斗争中也往往注重反右,忽视反“左”。粉碎“四人帮”之后,几十年形成的“左”的思想和影响不可能马上消除。事实上,当时全国人民对毛泽东的错误还缺乏深刻认识,仍把毛泽东看成是神。可以说,“左”倾思想及其影响的严重存在,是华国锋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推行“左”的政策的主观条件。

第二,华国锋接班的特殊历史条件是他坚持“两个凡是”和“左”的思想理论的重要原因。毛泽东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认为他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挑选接班人的问题上,是否能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条件。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越来越多,毛泽东也日渐忧虑“文化大革命”被否定。1972年,毛泽东针对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表示了不满,认为林彪是“极右”,他担心批判和纠正“左”的错误将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后来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也是借题发挥,借批判儒家反对变革、肯定法家坚持变革的办法维护“文化大革命”这一他认为的“深刻变革”,并把矛头对准否定和抵制“文革”者。

1975年底,毛泽东决定批邓,也是因为不能容忍邓小平通过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他认为邓小平的整顿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曾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婉言拒绝了,他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

何论魏晋。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毛泽东病重,接班人问题迫在眉睫。此时,毛泽东已对江青一伙的篡党夺权野心有所察觉,也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为广大群众所不满,因此不会把权力交给他们;另外,毛泽东也深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反对“文化大革命”,故对他们也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选择了“重厚少文”的华国锋接班,把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权力交给了他。

1976年6月,病榻上的毛泽东跟华国锋等人谈话。毛泽东称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日本人、蒋介石,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于前者持异议的人不多,只不过有几个人要求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对于后者“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sup>①</sup>。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去世前的悲凉心境,他向华国锋等人的苦心交待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他们维护“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接班,也就决定了他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维护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治取向。关于这一点,华国锋在十一大报告中有明确的说明。他阐明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称它是毛泽东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他还指出,文化大革命已胜利结束,“但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我们一定是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sup>②</sup>。这就是华国锋推行“抓纲治国”政策和“两个凡

---

① 汤应武:《1976年以来的中国》,第13~1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② 张伟瑄等主编:《共和国风云四十年》(下),第707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是”路线的特殊背景。

第三,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方针也是出于维护他个人地位的实际需要。众所周知,华国锋最大的政治资本就是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并确定他为接班人。因此,华国锋掌握党政军最高权力后,充分地利用这一点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甚至搞起了新的个人崇拜。

华国锋通过毛泽东亲笔写给他的指示“你办事,我放心”,宣扬毛泽东对他的无限信任,宣传他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与此同时,报刊电台也一再宣传他粉碎“四人帮”的功劳,称其“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显示了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的领袖高尚的品质、卓越的才能、革命的胆略和英明的远见”,“不愧为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为我们党的领袖,是革命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胜利前进的可靠保证”。所有这些宣传和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的目的是一样的,即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树立和巩固个人在党内的领袖地位。

第四,华国锋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也和他的资历、能力和学识相关。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中,相对说来,华国锋的资历是比较浅的,水平也有限。他从县委书记升到省级,再调到中央,直至最后被确定为接班人,主要是靠毛泽东的赏识。而且,他面对的是一个拥有 10 亿人口的大国和 3000 多万党员的大党,以及文革结束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复杂局面。他没有一位伟大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他自身条件的局限也不足以使他具有开创性行为,更不足以使他摆脱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的束缚。事实表明,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华国锋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不能正确解决时代提出的迫切的问题,也就不能引导中国走向一条崭新的现